

“保增长”须旗帜鲜明

周子勋

最近一段时间,国内外市场对今年中国经济的前景和宏观政策的松紧热议不断。近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访问英国、希腊两国期间,多次对世界作出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的“国际承诺”。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其在英国智库演讲时,首次明确用7.5%“下限论”代替了7.5%“左右论”。他说,就眼前来说,中国政府对经济的运行实行区间调控、定向调控,保证它的下限不超过7.5%。而这种“保增长”的信号在近期也有较为鲜明的释放,5月底,在主持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会时,李克强已经提到人大通过的年度增长目标必须完成,暗示高层对于保7.5%已有坚决态度。

总理的密集表态一方面强化了市场对下半年中国经济的信心,另一方面又引来各界对政府过度刺激经济的担忧,质疑改革是否会因稳增长停滞。当前,中央连续“微刺激”,地方巩固外贸、扩大投资都在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经济回暖趋势明显。官方数据显示,用电量、铁路货运量和新增银行贷款一道组成的“克强指数”在5月也实现全面回升。其中,5月新增信贷规模达8708亿元,超出市场预期。这显示一系列稳增长政策正逐步奏效。再加上5

月份工业增加值、消费品零售总额、物价水平等多项数据向好,6月份中国经济进一步企稳确定无疑。

但是,正如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刘树成日前对媒体所言,近三年来,每年形成了一个“经济增速下滑—微刺激—小幅反弹—再下滑”的循环圈。大体上说,每年上半年经济增速下滑,年中采取微刺激措施,下半年经济增速小幅反弹,下一年的上半年经济增速又继续下滑。为摆脱这种循环圈,避免年年打“下限保卫战”,就要改革宏观调控方式。第一,改革宏观调控思维方式,由守住下限,到把握中线;第二,改革宏观调控工作方式,由应急式的项目应对,到中长期的总体应对。

对于上半年中国经济,有人总结出几个“差异”现象值得关注:一是宏观比微观要乐观。尤其是5月份的官方经济数据显示经济有回暖迹象,但来自企业层面的反映显示,微观经济十分低迷。许多行业内的实业企业都表示,今年的日子尤其不好过,成本依然在往上涨,但市场却到处都在收缩。二是中央比地方乐观。中央认为能够确保中国经济不失速,但一些地方政府则对此忧虑重重。三是金融业比实业的情况明显要好。虽然金融业也抱怨今年的压力大,但它们的日子还是能过得

去,只是没有过去那样滋润,银行业尤其如此;与之相比,实业企业的情况十分糟糕,不少地方的企业成批关闭,处在生死关头。四是外部感受比内部感受乐观。由于中国政府不断对外宣传,中国领导人手拿大订单在全世界采购,外界对中国经济的信心要比国内市场的更强。

不可否认,本届中央政府上任以来,尤其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推动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但在过去的市场生态和利益格局出现固化的情况下,进行系统的市场化改革,不仅难度大,而且见效慢。因此,企业在经济下行之时,普遍感到市场环境不好,不少民营企业甚至表示,千万不能让市场化离中国越来越远!值得关注的是,国务院将对已出台政策落实情况开展全面督查。可以相信,通过强化政策落实,进一步打通政策执行层面的各种梗阻,提升政策效率,并提高金融资源的使用效率。这一方面可以服务于市场,另一方面可以减轻全面放松货币政策的压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经济需要一些疏经活血的措施,如适度扩大投资,微刺激经济增长,打通市场梗阻,增强企业活力,推进市场化改革等。这些方面都要落到实处,理由很简单,在经济增长的质量短期难以大幅提高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不能再下滑了。

李克强总理近期公开表示能够实现7.5%的既定经济增长目标,实际上是在回答市场上的种种猜疑。李克强表示:“尽管有相当大的下行压力,中国经济正在稳步前进。我们将继续在必要时做出预见性和适度的调整,

我们有充分的准备去化解各种风险。我们有信心实现今年的增长目标。”如果理解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决策和政策出台的特点,就不难理解李克强总理此番表态的含义。很明显,中国政府过去软性的指导性的7.5%目标,现在已经逐渐变成必须保证的经济增长目标。中国下半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将会围绕保7.5%而展开。

最近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没有提出货币政策的变动,反而强调要在财税政策上做文章,要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出台。这表明,最高层要求货币政策回到稳定的角色。与这一消息相呼应的是,传出金融当局有新的取向,在当前经济运行的态势下,货币政策要再度强调稳健的基调。而运用货币政策的调控,短期内仍将继续运用公开市场操作,维持流动性预期稳定,资金投放保持灵活性,信贷强定向支持实体经济,都将是近期货币政策的主要特征。在货币政策取向不变、力度不变的同时,金融当局将会强化预期管理。

中国在经济政策上需要处理好改革与稳定发展的关系,而这也是当前政府最为纠结的一点。中央小心翼翼地避免说加大刺激,担心重蹈4万亿覆辙,而实际上,当前国内市场情况与2009年时大不相同,即使有同样的政策也不会有当时的刺激力度。转型改革与稳定发展都有迫切性,都需要更有力度地来执行。最重要的是,政府在政策制定上要清晰地传递保增长的信号,并展示可能的刺激政策工具。

焦点评论

北京等四个城市获准试点“以房养老”



以房养老是构想,四城试点做闯将。曾经年少爱追梦,终终身衰求保障。金融创新易冲动,制度设计要稳当。老龄社会已来临,银发产业似朝阳。

赵乃育/漫画
孙勇/诗

地方积极松绑限购的“醉翁之意”

李宇嘉

沈阳松绑限购的“短命政令”一天夭折之后不久,近日又传出广州南沙对港澳人士松绑限购、温州对一手住房松绑限购的传闻。不出意外的话,广州、温州难逃“政府放风—媒体关注—政府辟谣”的怪圈。目前,全国有46个城市出台过限购政策,2014年以来,包括沈阳在内,有20多个城市有过“松绑限购”的传闻。但是,至今没有一个城市敢明目张胆地公开宣称放松限购政策。

在地方政府是否有权放松限购的问题上,今年3月份“两会”提出的“分类调控”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复。对于那些供应过剩、供求关系失衡的城市,当地政府要从防范风险的角度出发,自主调整楼市政策。

而且,在如何执行“分类调控”的问题上,近期住建部也给出了操作的基本原则。在6月4日召开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住建部总工程师冯俊对于未来地方政府如何调整楼市政策做出了表态,即各地调整楼市政策的总基调是“始终鼓励保护消费需求,遏制投资需求”;是否取消限购的问题,每个地方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判断;库存量大、供过于求的城市要执行好首套房最低首付比例、贷款利率优惠的政策。

既然限购取消与否的权利在地方政府,若本地楼市供应过剩,地方就可以手持管理层授予的“尚方宝剑”来取消限购政策。从天津放松滨海新区限购、沈阳放松全市限购,以及这次广州传言之放开南沙新区限购来看,这几个地方楼市的一个通病就是供应过剩,供求关系失衡。笔者日前曾去过滨海新区和广州南沙,虽贵为国家级新区,但这两个新区产业发展规划的落地工作还未见动静,楼市却先行发展起来,目前看已经成为区域性的“空城”。由于基础和配套设施建设严重滞后,而且这一局面在一两年内难以改观,这两个区域应该属于库存量大、供过于求的区域。

沈阳的问题就更严重了。根据上海易居研究院的数据,截至今年5月底,沈阳新建住宅库存为1828万平方米,远超京沪,仅次于天津的2110万平米,库存在全国排名第二。按过去6个月的移动平均销量,上述库存需要22个月才能去化完,与杭州和天津相近。后续供应规模更大,截至2013年,沈阳的房屋施工面积为11568.3万平方米,按照当年2262.3万平方米的商品房销售规模,即便未来不增加土地出让,存量后续供应也要5年才能消化完毕。但作为一个老工业城市,人口偏老龄化、产业升级慢,沈阳住房需求本身有限且过去几年过度释放,2010年至2013年,沈阳销售面积接近8000万平方米,超过上海、武汉等城市,而其常住人口为826万人,需求或提前透支,在巨大的库存面前,未来市场可能面临需求动力不足。

既然是否取消限购的决定权在地方,而上述三地松绑限购也符合“分类调控”的基本原则,而且作为控制房价快速上涨的短期性、行政性应急措施,限购已经不适应目前楼市下行的环境,为何地方政府不仅不敢公开发文松绑限购,而且

还步调一致地事后否认松绑限购的传言,放松限购真的是不能触碰的红线吗?道理上讲,地方政府根据本地楼市实际情况,自主调整政策(包括限购)不假;库存压力大、供应过剩的城市,为防范供应过剩风险可以调整政策(包括限购)也不假;而限购作为行政干预措施,其弊端也为各方所指,应当适时退出这也不假。假的却是地方政府如此积极松绑限购,打的是“分类调控”、“自主调控”、防范楼市风险、取消行政干预等等这些堂而皇之、边界广泛但内容却无法控制的正能量口号,而其背后的目的却是对于传统增长模式及其自身利益的迷思而不悔改。

地方政府松绑限购,其表面上看是为了缓解楼市疲软的局面,根本的目的却是希望楼市继续走上繁荣的通道,以此来刺激土地出让、政府融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最终实现经济增长、税收增长和官员自身利益这三重目的。因为,若楼市量价疲软,将直接导致开发商紧缩拿地,新开工和施工等房地产建设活动也急剧放缓。这样的话,政府靠土地抵押也无法实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也迅速下滑,实现政府“宏图大志”的一些项目也无法上马,不仅旧债无法偿还,税收和经济增长这两个考核政府要员业绩最主要的指标也无法完成,官员个人的政治经济利益也就无法实现。

因此,地方政府挖空心思地图谋松绑限购,用意不在对症下药地解决当前楼市存在的问题,也不在防范楼市风险和促进楼市长期健康发展,更不在通过缓解楼市下滑来为经济“调结构、促转型”战略留足时间和空间,而在于以楼市为工具来维护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和自身的经济政治利益。

以天津和广州这两个城市为例,上述两个城市设立的滨海新区和南沙新区,均为国家级的新区。其中,滨海新区是国务院批准的第一个国家综合改革创新区,承担着创新科技、发展高端产业、打造我国第三增长极等科学发展排头兵的重任;而根据国务院的批复,广州南沙新区承担着建设成为粤港澳优质生活圈和新型城市化典范、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新高地、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综合服务枢纽、社会管理服务创新试验区,打造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等综合改革和发展的重任。

但是,在新区批复后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并没有看到其在国家赋予的历史使命上有多么大的进展。而且,在新区开发和建设的过程中,基础设施、产业规划、改革措施并没有先行和实质性落地,反倒是一波又一波的泡沫化浪潮。在楼市步入下行周期后,被楼市泡沫带动的经济虚假繁荣而掩盖的问题开始暴露;通过发展房地产来拉动投资和税收、经济增长,依然是地方政府最为看重的工具,即便是广州、天津等前沿城市也概莫能外,更别提南宁、铜陵等中小城市,而改革和创新的任务一直以裸泳的状态在推进,甚至被有意无意地遗忘。这个时候,如果允许放松限购,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调结构、促转型”的重任渐行渐远。

(作者单位: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

给审计署支一招 查一查电力公司仓库

谈美

近日,审计署发布“西电东送”21个输变电项目审计结果,引起广泛关注。此次审计发现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在输变电建设管理中,存在着涉及工程招投标、设备材料采购、建设资金使用等方面的违法违规案件线索,涉及资金达66.83亿;国家电网下属6个省市自治区公司套取建设资金私设“小金库”总金额达到13.8亿。

这一审计结果之所以被社会广泛关注,我想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涉及金额比较大,仅小金库的金额就接近14亿元;二是电网建设是除了高铁以外投资最大的领域,相关数据显示,国家电网在“十一五”期间仅仅农电系统的改造就投入了3075亿元,而根据计划,“十二五”期间,国家电网公司将安排4100亿元用于农村电网改造,加上南方电网公司的农网改造,两网公司投资合计达到5216亿元。笔者未能查到“十一五”以来城市电网改造的资金投入,以及特高压已投入的资金,如果把这笔资金加起来,数据一定是惊人的。

“西电东送”于1993年8月启动,至2013年6月,核准并开工建设输变电项目48个,概算总投资2825亿元。不到3000亿元的投资就查出了近70亿的违规资金(这次公布的是其中21个项目的审计结果),所以,有必要对电网改造等也进行全面的和严格的审计。国家审计署正在对国家电网进行

例行审计。自审计署进驻后,一些地方电力公司内部高度紧张,有的还设立了专门的团队来应对审计。这自然提高了审计署工作的难度。那么,有没有一些独特的审计思路呢?

笔者有次在东部一个城市的郊区看到一个电力公司的仓库,占地大概有10多亩。附近农民告诉我,这些年每年都几次看到大量的材料如电缆之类运进去,但没有看到运出来过。当时笔者很疑惑,前几年国家电网就推行了省级及总公司级材料的集中采购和配送,下级机构都是根据需求来申请材料的,何来大量的电缆进来了就在仓库里放几年?原来这里边有大文章。电力系统内部曾查出过这样的案例:一些地区级和县级电力公司通过虚构改造工程的套取资金,为了编造得像,材料照样向上级公司申请,以至于出现了上面那样的情况。而且,一些电力公司为了套取资金,对前些年改造过的、并不需要改造的工程再次改造。这样的案例是否仅仅个案呢?比照“西电东送”的情况来看,很可能是一种普遍现象。所以,国家审计署有必要将这块作为一个审计的重点。

笔者建议,审计署不妨去各地电力公司仓库看一看。如果搞不清楚一个地方的电力公司到底有多少仓库,这些仓库在哪里,可以寻求地方国土资源等部门的帮助,甚至还可以请公安协助,看看有没有电力公司在得到要查仓库的消息后,将仓库里的东西抢运出去的。这样或许还真能查出些问题。

中国宏观经济统计迈向大数据2.0时代

许岩

5月份宏观经济数据一出来,即引来各方专家解读。略有不同的是,来自统计业内的动向显示,包括CPI在内的宏观经济数据正面临一场变革。这场变革是大数据时代的一种必然。我国宏观经济数据正从自产自销的1.0时代走向借助全社会大数据的2.0时代。

大数据并不是单纯的海量数据,它更蕴含着一种计算和思维方式的转变。我们要通过对海量数据的交换、整合和分析,发现新的知识,创造新的价值,带来新的发现。

大数据比传统抽样调查的优势就在于,大数据是采集每个可以采集的数据点,用全面数据代替了抽样、片面、局部的数据。分析数据,就是为了从数字中寻找可能的规律。一个真实过硬的数据

体系,更有益于科学决策,造福于社会。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有过一个著名论断:中国人不善于用数目字管理,对古币存世量的讨论,大多含糊其辞。

我国现行的《统计法》历经1996年和2009年两次修订。社会各方越来越重视分析比较各类数据。不过,现实表明,我们的宏观经济数据的统计工作仍有大力提升的空间。2013年全国31省市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之和约为63万亿,这个数据超出了全国GDP总量逾6.1万亿。事实上,像这样巨大的统计“误差”绝非个例。出现这类统计误差,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统计标准不一,比如未能有效厘清对特殊企业特殊行业的统计内容;二是统计中掺有政绩“水分”,这也是导致统计误差的重要原因。

在抽样分析时数据测量能力有限,而大数据能获得更加全面真实的数据,并且对宏观趋势给出快速预测。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已经能够自己说话,传统的科学统计模型已经过时,理论也可能被终结。

大数据的测量往往也超出我们的想象。在房地产价格统计上,银行的贷款信息及住建部门的网签数据能让房地产价格数据更真实可靠;在就业领域,搜索引擎大数据可以帮助监测预警失业率和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通过钢铁、有色金属、能源、水泥的贸易数据判断供需走势等等。这些不是异想天开,它们一旦落地,将大大提升宏观经济数据的精细化,提高决策的科学性。

正如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所说,“谁拥有了大数据,谁就占有了制高点。就政府而言,大数据必将成为宏观调控、国家治理、社会管理的信息基础”。他的

话可谓高屋建瓴。今年全国两会就有人大代表提出,可以通过分析春节期间移动用户漫游情况,掌握人口的流动规模与迁徙规律,为交通管理、铁路运输、公共安全管理等提供决策参考。这是挖掘大数据价值的现实建议。

与不少发达国家已把大数据的开发应用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相比,我国的大数据管理还处萌芽状态。重复性、轻定量,重观点、轻数据的思维惯性,使得我们在数据收集、使用和管理上不太灵敏。

目前,虽然各方都为挖掘大数据开发了很多工具,但大数据的成熟应用还有很长一段时间。首先,数据杂乱,价值密度低,如何有效地收集数据信息仍没有成熟的方案。同时,数据的规模并不能决定一切,不论是哪种数据分析方式,都可能存在统计上的缺陷,不能说数据更大、更新、更快就没有问题。

联系我们

本版文章如无特别申明,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也不代表作者供职机构的观点。如果您想发表评论,请打电话给0755-83501640;发电子邮箱至 ppll18@126.com。